

流动人口城市公共服务获取与居留意愿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刘乃全¹ 宇 畅² 赵海涛³

(1.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2.上海大学理学院,上海 200444;
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以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样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户籍因素、个体特征、职业特征、家庭因素、流动特征和城市异质性对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公共服务获取特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更难以获取城市公共服务,而且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更低;但对已经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流动人口而言,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无显著差异;另外,人力资本素质较高、家庭负担较小或大型城市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且留城意愿较强。在户籍约束下,实现流动人口城市公共服务“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转变,是当前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流动人口;长三角;公共服务;留城意愿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6.013

[中图分类号] F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7)06-0112-10

一、引言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的统计数据,截止 2016 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 2.4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涌入到城市当中,对城市提出了越来越高的公共服务需求。然而,有大量文献如蔡秀云等(2012)^[1]、杨昕(2008)^[2]、吴业苗(2012)^[3]、韩福国(2016)^[4]发现中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水平偏低,且公共服务的供给较少考虑当地的流动人口,这提高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难度,尤其是处在制度隔离之外农民工群体。Wong 等(2007)^[5]、郑秉文(2008)^[6]、陈云松和张翼(2015)^[7]认为由于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面临生活上的各种

困难,日益呈现出边缘化的特点。

很多研究如童玉芬和王莹莹(2015)^[8]、侯慧丽(2016)^[9]指出除了获取较高的收入之外,获取更好的城市公共服务是流动人口在城乡间、城市间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在城乡间、城市间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因此,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政府都有责任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从根本上看,流动人口之所以无法获取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是户籍制度造成的。Knight 等(2004)^[10]、严善平(2006)^[11]、白南生和李靖(2008)^[12]、梁雄军等(2007)^[13]、王子成和赵忠(2013)^[14]认为在户籍约束下,国内流动人口的流动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5BRK025)、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超大城市流动偏好研究”(项目编号:2017EJB006)、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户籍约束下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社会融合研究”(项目编号:ZZGCD16032)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校启 2017-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乃全(1969-)男,山东蒙阴人,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与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移民(跨国移民、洲际流动等)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农村户籍的劳动力表现出极高的流动性,主要体现为职业不稳定、“候鸟式”迁移、居住隔离、社会融入困难、居留意愿不强等。尽管近些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逐渐放宽了外来人口的户籍管理政策,但何英华(2004)^[15]、樊士德和严文沁(2015)^[16]发现作为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人口密集的长三角地区,户籍制度仍然相对较紧,该地区流动人口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限制。在此背景下,研究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获取情况,将有助于透视制度性障碍的影响效应。此外,长三角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为集聚的地区之一,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国务院在2008年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创新,建立健全区域内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协调机制。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揭示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阐述了户籍制度、人力资本、家庭因素、流动特征和城市异质性的影响效应,为政府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依据;第二,进一步探讨了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取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为认识和理解当前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特征、社会融入和市民化提供了经验补充。

二、文献回顾

在二元城乡结构背景下,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成为弱势群体,主要表现在无法与当地居民享有公平的获取公共服务的权利。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原因:从制度层面,夏继军(2004)^[17]、王丽娟(2010)^[18]等认为户籍制度使得地方政府轻松规避了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基于自身利益,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可以选择和甄别流动人口;从社会治理层面梁城城(2017)^[19]、缪蒂生(2008)^[20]、陈丰(2012)^[21]等认为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存在着明显脱节,理念陈旧和管理制度缺陷是导致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落后的重要原因;从财政激励层面,孙红玲(2013)^[22]、甘行琼等(2015)^[23]等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不足和扭曲是导致其不愿意承担流动人

口公共服务供给支出的原因。

从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角度,国内外很多研究分析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作用。Tiebout(1956)最早将地区公共服务纳入到人口迁移理论中去,提出居民会基于偏好对不同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的地区做出是否迁移选择,即著名的“用脚投票”机制^[24];Oates(1969)通过分析城市公共服务与房地产价值之间的关系,得出公共服务好、税率低的地区容易吸引人口流入,进而引起该地房价的上升,该结论验证了“用脚投票”机制^[25];后来,很多研究者如Quigley(1985)^[26]、Rapaport(1997)^[27]、Bayoh等(2006)^[28]、Dahlberg等(2012)^[29]通过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公共服务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公共服务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国内也逐渐开始关注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付文林(2007)考察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户籍人口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会引起当地户籍人口的增加,但人力资本素质较低的流动人口面临当地公共福利的歧视^[30];董玉芬、王莹莹(2015)以流动个体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讨论了流动人口偏好超大城市的原因,研究发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是吸引流动人口流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超大城市具有更高的公共服务支出,提高了流动人口流入的概率^[8];侯慧丽(2016)将公共服务划分为工业公民资格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民资格公共服务,研究了两者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两种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均具有吸引力,获取公共服务有助于流动人口短期内定居下来,但城市规模会影响流动人口获取两种公共服务的可行性^[9]。

在户籍制度下,由于无法获得充分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居民身份,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决策是要不要在城市长期居住。国内外很多研究如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31]、任远(2006)^[32]、Zhu(2007)^[33]、蔡禾和王进(2007)^[34]、夏怡然(2010)^[35]、Fan(2011)^[36]、李树茁等(2014)^[37]等分别基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职业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融合等角度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近年来,少数文献考察了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蔚志新(2013)采用5个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参加

社会保险对浙江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38];侯慧丽(2016)基于城市规模的差异,考察了参加养老保险、建立健康档案对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共服务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大城市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效用要大于小城市^[9]。以上研究丰富了对流动人口获取公共服务和留城意愿这一领域的认识,但均未识别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和居留意愿的影响,而且关于影响因素分析和公共服务变量选取不够充分和全面。

总之,很多研究分析了有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相关问题,但对此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缺少对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另外,在研究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问题上,大多数研究也没有系统考察流动人口获取公共服务特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户籍背景下,系统考察了长三角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取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获取情况对其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从而阐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和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设定、数据和变量

(一) 理论模型

关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参考 Hunt 和 Muel-ler(2004)^[39]关于移民模型的设定,假设流动人口*i*在城市*j*定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_{ij} = U(s_{ij}, \theta_{ij}) \quad (1)$$

其中, s_{ij} 代表流动人口*i*在城市*j*获取公共服务的水平; θ_{ij} 代表影响流动人口*i*在城市*j*定居的其他影响因素,包括户籍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城市因素等等。

流动人口*i*在城市*j*定居后直到退休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LU_{ij} = \int_0^T U_{ij}(\cdot) e^{-\rho t} dt \quad (2)$$

其中 $T = T^* - y_i$ 代表流动人口定居后的工作时间; T^* 代表预期寿命; y_i 代表流动人口*i*的年龄; $e^{-\rho t}$ 代表折现因子,其中折现率为 ρ , τ 代表持续时间。

假设流动人口在今后的效用函数结构和折现率 ρ 均保持不变,则效用函数(2)可以表示为:

$$LU_{ij} = \frac{1}{\rho} U_{ij}(\cdot) \{1 - \exp[-\rho(T^* - y_i)]\} \quad (3)$$

即流动人口*i*在城市*j*定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LU_{ij} = LU(\rho, y_i, s_{ij}, \theta_{ij}) \quad (4)$$

设定 $j=0$ 代表流动人口不在城市*j*定居,则流动人口*i*不在城市*j*定居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_{i0} = U(s_{i0}, \theta_{i0}) \quad (5)$$

相应的,流动人口*i*不在城市*j*定居后直到退休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LU_{i0} = LU(\rho, y_i, s_{i0}, \theta_{i0}) \quad (6)$$

在一个随机设定中,流动人口*i*选择在城市*j*定居的过程可以表示为:

$$P_{ij} = \text{Prob} [(LU_{ij} + \varepsilon_{ij}) \geq (LU_{i0} + \varepsilon_{i0})] \quad j \neq 0 \quad (7)$$

其中, ε_{ij} 和 ε_{i0} 为随机扰动,基于需要可以假设其服从相应随机分布(例如正态分布、逻辑分布等)。

因此,流动人口*i*选择在城市*j*定居的概率是依赖于变量集 $Z = (y_i, s_{ij}, s_{i0}, \theta_{ij}, \theta_{i0})$ 的函数。

(二) 实证模型

为了系统考察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特征,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text{pub_service} = \alpha_0 + \alpha_1 \text{rural_reg} + \sum_{b=1}^l \theta_b X_b + \sum_{m=1}^n \lambda_m Y_m + \mu_j M_j + \eta_j \text{City}_j + u \quad (8)$$

其中, pub_service 代表城市公共服务变量, rural_reg 代表农村户籍虚拟变量; X 代表个体特征变量; Y 代表家庭特征变量; M 代表城市流动模式变量; City 代表城市规模变量; u 为残差项。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共资源获取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基于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建立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实证模型:

$$\text{city_will} = \beta_0 + \beta_1 \text{pub_service} + \sum_{i=1}^n \mu_i Z_i + \varepsilon \quad (9)$$

其中, city_will 代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 Z 代表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其他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城市因素等。

基于理论模型(7)的设定,如果假设 ε_{ij} 和 ε_{i0} 均服从正态分布,则模型(9)可以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①。

(三) 数据和变量

本文采用的是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随机原则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针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15-59 周岁流动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省市)流动人口抽样数据为分析对象,样本总量为 38998 个。

借鉴蔡秀云等(2012)^[1]、韩福国(2016)^[4]对城市公共服务分类的做法,本文选取了城市社会保障、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障四个变量作为代表城市公共服务的核心变量。其中,城市社会保障变量(0/1)指是否获得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中的一种或几种;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变量(0/1)指是否已经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变量(0/1)指是否获得职业病防治、艾滋病防治、生殖与避孕、结核病防治、性病防治、精神障碍防治、慢性病防治、营养健康知识、其他传染病防治的教育中的一种或几种;城市医疗保障变量(0/1)指是否获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公费医疗中的一种或几种。

表 1 列出了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情况。整体来看,除了获取健康教育的水平在 60.5% 之外,流动人口获得城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概率都较低。另外,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往往同时获得了社会保障、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障中的多种服务,所以与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仍然较低。

表 1 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保障	38998	0.323	0.468	0	1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38988	0.127	0.333	0	1
健康教育	38998	0.605	0.489	0	1
医疗保障	38998	0.357	0.479	0	1

由于在流动人口样本中同时包含城镇户籍劳动力和农村户籍劳动力,考虑到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可能存在着差异,表 2 列出了两类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情况。对比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均值数据可以看出,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获取公共服务的概率均高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尤其表现在最

重要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上,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获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比例均接近 70%,远高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

表 2 分户籍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均值统计

	社会保障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城镇户籍	0.689	0.181	0.683	0.699
农村户籍	0.268	0.119	0.593	0.305

为了进一步考察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可能对其获取城市公共服务带来的影响,表 3 列出了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情况。从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首先,汉族群体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高于少数民族群体;其次,随着流动人口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也不断提高;第三,不同性别特征和婚姻状况的流动人口在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上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以个人特征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

表 3 公共服务的均值统计

		社会保障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性别	女性	0.310	0.145	0.633	0.335
	男性	0.333	0.113	0.583	0.374
民族	汉族	0.328	0.129	0.607	0.359
	少数民族	0.224	0.0880	0.550	0.324
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0.122	0.0713	0.457	0.182
	小学	0.171	0.0921	0.524	0.212
	初中	0.239	0.119	0.591	0.280
	高中	0.427	0.142	0.658	0.451
	大学专科	0.663	0.167	0.694	0.668
	大学本科	0.855	0.214	0.714	0.859
婚姻状况	研究生	0.970	0.249	0.763	0.964
	未婚	0.329	0.0967	0.572	0.393
	已婚	0.322	0.135	0.613	0.348

很多研究如韩福国(2016)^[4]、李树茁等(2014)^[36]认为,流动人口的职业状况是其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相应的,表 4 列出了不同职业特征的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情况。表 4 数据显示,职业特征与公共资源获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相对而言,非体力劳动者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要显著高于体力劳动者,而且雇员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要高于雇主或自营劳动者。

以工作特征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

表 4 公共服务的均值统计

		社会保障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是否体力劳动	体力劳动	0.281	0.121	0.597	0.316
	非体力劳动	0.715	0.182	0.679	0.740
是否雇员	雇员	0.419	0.121	0.597	0.478
	雇主/自营劳动	0.156	0.131	0.627	0.141

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家庭特征可能对其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产生影响,表5列出了不同家庭孩子数量下流动人口获取公共服务的情况。从表5中数据可以看出,家庭没孩子的流动人口获取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最高;对于家庭有孩子的家庭而言,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逐渐降低。尤其对于家庭有5个孩子的流动人口,其获取社会保障的比重仅占4%。

表5 以家庭孩子数量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均值统计

孩子数量	社会保障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0	0.507	0.158	0.659	0.528
1	0.368	0.146	0.642	0.387
2	0.241	0.116	0.574	0.278
3	0.192	0.107	0.514	0.232
4	0.155	0.0805	0.489	0.172
5	0.0400	0.0800	0.400	0.120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郭力等(2011)认为,流动人口的流动表现出跨省、跨市和市内流动等不同模式,不同流动模式的劳动者在流动特征上存在着较大差异^[40]。表6列出了不同流动模式下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情况,从数据可以发现省内城市流动的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是最高的,其次是跨省流动人口,而市内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最低。

表6 以流动模式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均值统计

	社会保障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跨省流动	0.317	0.118	0.584	0.361
省内城市流动	0.372	0.194	0.680	0.374
市内流动	0.284	0.133	0.639	0.288

参考侯慧丽(2016)^[9]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划分,本文基于《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划分为大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两类。表7列出了两类城市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统计。

表7 以城市规模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均值统计

	社会保障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大型城市	0.488	0.189	0.649	0.486
中小城市	0.281	0.111	0.519	0.324

从表7的统计结果来看,处在大型城市的流动人口整体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要高于中小城市。

结合表1-7的数据结果,为了检验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特征,需要综合考察流动人口的户籍状况、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模式和城市规模对其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表8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8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	38998	0.564	0.496	0	1
少数民族	38998	0.0420	0.200	0	1
年龄	38998	32.56	9.208	16	59
教育年限	38998	9.734	3.054	0	18
已婚	38998	0.797	0.402	0	1
农村户籍	38998	0.868	0.339	0	1
非体力劳动	38998	0.0975	0.297	0	1
雇主/自营劳动	35283	0.290	0.454	0	1
家庭总收入(元)	38998	3029	2527	400	150000
家庭孩子数量	31589	1.403	0.701	0	5
省内城市流动	38998	0.917	0.276	0	1
大型城市	38998	0.795	0.404	0	1

四、流动人口城市公共服务获取:实证结果

表9列出了实证模型(8)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的因变量“公共服务”是对社会保障、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医疗保障四个变量采用主成因素分析,并以主成因素的方差贡献为权重计算的代表城市公共服务的整合变量^②;表中第1列为采用了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的结果;表中第2-5列结果是采用了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的偏效应。

整体来看,流动人口的户籍、个体特征、家庭因素、流动模式和城市规模对于其获取城市公共服务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

第一,相对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农民户籍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显著较低,而且从数量来看,对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来说,户籍变量的影响效应更大。这表明户籍约束仍然是阻碍农村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原因,尽管近些年来部分中小城市已经逐步放开户籍门槛,但长三角地区相对较紧的户籍限制仍然使得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大打折扣。

第二,从个体因素来看,相对于男性,女性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取城市公共服务,可能的解释是基于生理上的差异,女性流动人口在养老保障、医疗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的需求更强,也更加积极主动的获取这方面的资源;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劣势,这可能源于

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难以获得有关公共服务方面的信息和渠道,因而导致获取较少的城市公共服务;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是逐渐提高的,但这一增长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另外,受教育水平越高,流动人口更

容易获得城市公共服务,这一结果和相关研究如叶继红和李雪萍(2011)^[41]、韩福国(2016)^[41]、刘彦军(2016)^[42]的结论是一致的;最后,相对于未婚群体,已婚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更高,尽管婚姻状况对于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障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9 公共资源获取模型回归结果

	公共服务	分类别			
		社会保障	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医疗保障
农村户籍	-0.306*** (0.0129)	-0.717*** (0.0285)	-0.0746** (0.0303)	-0.0152 (0.0261)	-0.746*** (0.0287)
男性	-0.0787*** (0.00793)	-0.0854*** (0.0177)	-0.165*** (0.0196)	-0.191*** (0.0159)	-0.166*** (0.0175)
少数民族	-0.0869*** (0.0198)	-0.220*** (0.0456)	-0.136** (0.0547)	-0.0434 (0.0391)	-0.0654 (0.0424)
年龄	0.0469*** (0.00385)	0.127*** (0.00897)	0.0160 (0.00978)	0.0288*** (0.00764)	0.101*** (0.00871)
年龄平方	-0.000584*** (5.20e-05)	-0.00159*** (0.000122)	-0.000132 (0.000132)	-0.000404*** (0.000103)	-0.00128*** (0.000118)
教育年限	0.0578*** (0.00160)	0.129*** (0.00376)	0.0381*** (0.00404)	0.0450*** (0.00322)	0.108*** (0.00367)
已婚	0.0826*** (0.0305)	0.198*** (0.0679)	0.0954 (0.0789)	0.0932 (0.0608)	0.0612 (0.0658)
非体力劳动	0.239*** (0.0138)	0.530*** (0.0313)	0.152*** (0.0321)	0.0674** (0.0279)	0.492*** (0.0313)
雇主/自营劳动	-0.344*** (0.00857)	-0.915*** (0.0207)	-0.0480** (0.0213)	-0.106*** (0.0172)	-1.137*** (0.0211)
家庭总收入	1.59e-05*** (1.51e-06)	4.25e-05*** (3.42e-06)	9.64e-06*** (3.28e-06)	7.73e-06** (3.34e-06)	3.64e-05*** (3.44e-06)
家庭孩子数量	-0.0547*** (0.00621)	-0.111*** (0.0141)	-0.0538*** (0.0159)	-0.0754*** (0.0123)	-0.0622*** (0.0139)
省内城市流动	0.155*** (0.0138)	0.168*** (0.0318)	0.273*** (0.0313)	-0.0439 (0.0278)	0.223*** (0.0322)
大型城市	0.109*** (0.00984)	0.375*** (0.0215)	0.289*** (0.0233)	0.297*** (0.0196)	0.241*** (0.0215)
常数项	-1.068*** (0.0804)	-3.498*** (0.186)	-1.557*** (0.204)	-0.505*** (0.160)	-2.582*** (0.180)
样本量	28 339	28 346	28 339	28 346	28 346
R ² /Pseudo R ²	0.2264	0.2179	0.2210	0.2181	0.2188

注:***、**、* 分别表示估计值在1%、5%、10%水平下显著。

第三,从职业特征看,非体力劳动者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更具优势,且从数量来看,其影响效应十分明显;雇主/自营劳动者更难以获得城市公共服务,且从数量来看,影响效应也较大。该结果表明非体力劳动者由于在职业上的优势,更容易获得城市公共服务,而且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对象是雇员,雇主或自营职业者在获取公共服务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相关途径。

第四,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收入越多的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也越大,而家庭孩子数

量越多,越难以获得城市公共服务。该结果表明,家庭负担越小(经济压力小、孩子抚养责任小),越有利于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取公共服务,可能的解释是家庭负担越小,流动人口回流返乡的概率更低,在城市工作的时间更长久,因而容易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有关公共服务方面的信息和资源。

第五,从流动模式来看,进行省内城市流动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城市公共服务,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市内流动人口,跨城市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或者社会网络关系,因而也更容易获得城市

公共服务。另外,相对于跨省流动,跨城市流动人口面临的流动成本更低、文化差异越小,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途径和信息方面更有优势。

第六,从城市规模来看,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更高,这表明城市的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了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获取,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是供给层面,大城市由于在公共财政方面的优势,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较高,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城市公共服务;二是需求层面,在大型城市获得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总之,在户籍制度约束下,流动人口仍然难以与当地居民获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作为弱势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要改善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不利局面,除了从根本上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户籍限制之外,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的教育状况,给予其更好的职业培训,提高流动人口职业待遇和公民权利意识也十分重要。此外,从家庭视角来看,制定和实施包含土地、财政在内一揽子配套政策,从根源上减轻流动人口的家庭负担,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积极性,应该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取向。最后,要重视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的吸纳作用,引导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间进行合理配置。

五、流动人口城市公共服务获取对留城意愿的影响

数据显示,在长三角地区,有57.7%的流动人口想要在城市长期居住(5年以上),尽管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压力较大,成本较高(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比重不足12%),且获取比较有限的城市公共服务,但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活的主观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流动人口城市房产状况和居留意愿

表 10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房产拥有(0/1)	38998	0.119	0.324	0	1
长期居留意愿(0/1)	38998	0.577	0.494	0	1

那么,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情况对他的长期居留意愿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表11列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11 城市居留意愿模型估计结果

	全部样本	分类别			
公共服务	0.243*** (0.0122)				
社会保障		0.345*** (0.0191)			
健康档案			0.268*** (0.0242)		
健康教育				0.112*** (0.0161)	
医疗保障					0.359*** (0.0185)
农村户籍	-0.306*** (0.0129)	-0.717*** (0.0285)	-0.0746** (0.0303)	-0.0152 (0.0261)	-0.746*** (0.0287)
大城市	0.182*** (0.0204)	0.167*** (0.0204)	0.193*** (0.0203)	0.221*** (0.0203)	0.189*** (0.0203)
常数项	-1.628*** (0.163)	-1.730*** (0.162)	-1.881*** (0.162)	-1.887*** (0.162)	-1.816*** (0.162)
样本量	28,339	28,346	28,339	28,346	28,346
Pseudo R ²	0.2825	0.2512	0.2457	0.2437	0.2476

注:***、**、* 分别表示估计值在1%、5%、10%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限制,表中未列出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职业特征和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11是采用probit模型估计的偏效应。从表11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获取对于其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是促使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工作和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围绕户籍制度改革,给予流动人口更好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降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负担是促使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途径;而且从公共服务的重要性角度来看,分类别的估计结果显示,获取比较重要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的影响效应。另外,相对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水平显著较低。最后,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虽然户籍制度最紧,但流动人口在大型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最强,童玉芬和王莹莹(2015)^[8]认为,北上广地区的高工资、发达的第三产业和较好的公共服务是吸引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讨论户籍制度对于已经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在模型(9)中引入了城市公共服务相关变量与农村户籍的交互项,表12列出了相关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12的结果显示,交互项前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公共服务获取情况不依赖于户籍变

量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对于在城市已经获取部分或全部公共服务资源的流动人口而言,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在长期居留意愿方面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仅限于在城市未获取公共服务的群体。因此,表12的估计结果意味着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是户籍制度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如果剥离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供给差异,则户籍制度本身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定居意愿的影响是很小的。从这一结果来看,进一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覆盖率,将明显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

表12 城市居留意愿扩展模型估计结果

	全部样本	分性别			
公共服务* 农村户籍	0.0557 (0.0343)				
社会保障* 农村户籍		0.0288 (0.0534)			
健康档案* 农村户籍			0.101 (0.0661)		
健康教育* 农村户籍				0.129 (0.0847)	
医疗保障* 农村户籍					-0.00577 (0.0537)
大城市	0.183*** (0.0204)	0.168*** (0.0204)	0.194*** (0.0203)	0.222*** (0.0203)	0.189*** (0.0203)
常数项	-1.562*** (0.163)	-1.571*** (0.163)	-1.836*** (0.162)	-1.810*** (0.162)	-1.678*** (0.162)
样本量	28,339	28,346	28,339	28,346	28,346
Pseudo R ²	0.2531	0.2511	0.2458	0.2439	0.2477

注:***、**、* 分别表示估计值在1%、5%、10%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限制,表中未列出流动人口的户籍特征、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医疗保障、个体特征、职业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

六、结论

流动人口无法公平的享有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公共福利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的分析发现:(1)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获取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提高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取水平和质量仍有很大空间;(2)户籍因素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取的影响

是显著的,而且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影响更大;(3)相对而言,男性、汉族、已婚、非体力劳动者、雇员、省内城市流动或大城市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更有优势;(4)家庭负担越重的流动人口更难获得城市公共服务。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获取特征对其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能够显著提高其留城意愿,而且从数量看,相对重要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要更大。在城镇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背景下,城市公共政策应该更加偏重广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提高流动人口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减轻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动性。

中国城镇化发展不能局限于仅仅依靠提供就业机会暂时把大量流动人口吸引到当地,而更应该注重依托公共服务供给扩展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的空间,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的持久发展,而且有利于避免诸如贫富差距、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诸多社会问题。另外,考虑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需要依托公共财政和政策扶持加强对中小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从而促进不同规模城市间公共服务发展的均衡性和人口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限于数据约束,本文并未选取代表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变量,尽管迁移模式变量可以间接揭示部分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特征,但不能直接分析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特征对公共服务获取和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此,在可获得数据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讨论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效应。

【注】

①如果假设 ε_{ij} 和 ε_{i0} 均服从逻辑分布,则模型(9)可以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

②受篇幅的限制,本文并未列出主成分分析的相关结果。

参考文献:

[1]蔡秀云,李雪,汤寅昊. 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发展

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06): 58-65.

[2]杨昕. 影响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若干非制度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 社会科学, 2008, (10): 88-94.

[3]吴业苗.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应对: 一个公共服务视角的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 (03): 71-77.

[4]韩福国. 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影响差异分析——基于2012年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 (06): 44-55.

[5]Wong K; Fu D; Li C Y, et al.,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living a marginalized lif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7, 16(1): 32-40.

[6]郑秉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05): 2-17.

[7]陈云松, 张翼.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06): 78-95.

[8]童玉芬, 王莹莹. 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 为何北上广如此受青睐? ——基于个体成本收益分析[J]. 人口研究, 2015, (04): 49-56.

[9]侯慧丽. 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 (01): 118-125.

[10]Knight J, Yueh L. Job mobility of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4): 637-660.

[11]严善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J]. 管理世界, 2006, (08): 8-17.

[12]白南生, 李靖.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 (07): 70-76.

[13]梁雄军, 林云, 邵丹萍. 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03): 13-28.

[14]王子成, 赵忠.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 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J]. 管理世界, 2013, (01): 78-88.

[15]何英华. 户籍制度松紧程度的一个衡量[J]. 经济学(季刊), 2004, (S1): 99-124.

[16]樊士德, 严文沁.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户籍政策评价与前瞻[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4): 96-103.

[17]夏纪军.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4, (10): 56-65.

[18]王丽娟. 人口流动与财政竞争——基于财政分区和户口政策的比较视角[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03): 17-21.

[19]梁城城.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 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7, (04): 13-23.

[20]缪蒂生. 关于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思考[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 (02): 184-187.

[21]陈丰.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2, (06): 59-64.

[22]孙红玲.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改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J]. 财政研究, 2013, (03): 56-58.

[23]甘行琼, 刘大帅, 胡朋飞.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15, (10): 87-101.

[24]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05): 416-424.

[25]Oates W E.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77(6): 957-971.

[26]Quigley J M. Consumer choice of dwelling, neighborhood and public servic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5, 15(1): 41-63.

[27]Rapaport C. Housing demand and community cho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7, 42(2): 243-260.

[28]Bayoh I, Irwin E G, Haab T.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How important are local public goods in attracting homeowners to central city location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6, 46(1): 97-120.

[29]Dahlberg M, Eklöf M, Fredriksson P, et al. Estimating preferences for local public services using migration data [J]. Urban Studies, 2012, 49(2): 319-336.

[30]付文林. 人口流动的结构障碍: 基于公共支出竞争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2007, (12): 32-40.

[31]白南生, 何宇鹏. 回乡, 还是外出? ——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2, (03): 64-78.

[32]任远.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03): 67-72.

[33]Zhu Y.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7, 31(1): 65-76.

[34]蔡禾, 王进.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 社

会学研究 2007 (06): 86-113.

[35]夏怡然.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03): 35-44.

[36]Fan C C.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 [J]. China Review, 2011, 11(02): 11-41.

[37]李树苗, 王维博, 悦中山.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4, (02): 12-21.

[38]蔚志新. 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基于全国 5 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人口与经济, 2013 (04): 12-20.

[39]Hunt G L, Mueller R E. North American migration:

returns to skill, border effects, and mobility cost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 86(4): 988-1007.

[40]郭力, 陈浩, 曹亚. 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 6 省的农户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 (06): 45-53.

[41]叶继红, 李雪萍. 农民工共享城市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基于苏州市相城区的考察[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04): 12-17.

[42]刘彦军. 公共服务, 政府竞争与产业集团 [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6 (02): 1-9.

(责任编辑: 郝 涛)

Migrants'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Dwelling Will in C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LIU Naiquan¹, YU Chang², ZHAO Haitao³

(1.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migra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nfluencing effect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job characteristics, family factors,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city heterogeneity on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of migrant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on the dwelling will in city of migr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migrants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migrants of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e more difficult to obtain urban public service, and their dwelling will in city intends to be lower. But for migrants who have obtained urban public services,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s no difference in dwelling will. In addition, the migrants who have human capital of high quality or less family burden or come from large scale city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level of dwelling will is higher. With the constrai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nsuring migrant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and the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are th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Key Words: Migrants; Yangtze river delta; Public service; Dwelling will in city